

岳麓教育学人论丛

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易红郡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80168)
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2010YX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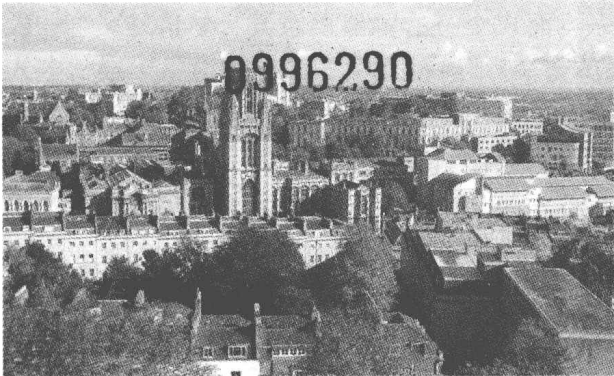
岳麓教育学人论丛

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易红郡 著



T0996290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 易红郡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648 - 0717 - 7

I. ①战… II. ①易…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政策—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G649. 56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6429 号

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易红郡 著

◇策划组稿: 何海龙 胡亚兰

◇责任编辑: 何海龙 胡亚兰

◇责任校对: 艾霏霏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92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717 - 7

◇定价: 46.00 元

《岳麓教育学人论丛》编委会

主 编：张传燧

副 主 编：刘铁芳 常思亮 高晓清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常思亮	方明军	龚 兵	高晓清	蒋红斌
姜新生	李爱良	李政云	刘德华	刘铁芳
刘 旭	罗建国	覃 兵	上官剑	王卫华
肖化移	辛继湘	易红郡	张传燧	张建中

本册审稿：杨汉麟

0033000

总序

南岳七十二峰，起于衡阳回雁，止于长沙岳麓。《南岳记》曰：“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因此而得名。

作为南岳之足的岳麓山，其实只是一座小山。海拔不过300米，绵延不过数十里。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岳麓山早已成为湖湘文化圣地。西晋以前，这里是道士修炼的“福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道教建筑。现存有明成化年间建立的云麓宫。晋初麓山寺建立后则成为湖湘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自北宋潭州太守朱洞创办书院于此，旋即成为儒家文化在南方传播的中心之一，与石鼓、白鹿洞、嵩阳并称四大书院。特别是南宋朱、张讲学岳麓，“从游者众，一时舆马之盛，饮马池（水）立涸”，“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也”。（《宋元学案补遗·南轩学案补遗》）岳麓文教气象遂达鼎盛。近代“中兴将相”从此出发，起晚清之回光。辛亥先贤魂归故里，使岳麓平添无限庄严。正如岳麓山大门所书对联云：“学正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勋高黄蔡，千秋伟业壮名山。”

岳麓作为一个文教符号，其意蕴显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就了历代大批经国济世人才，如“岳麓巨子”、“中兴将相”、辛亥英豪、革命志士等；二是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自由求知、广泛交流的学问精神；三是由黄兴、蔡锷所奠定的胸怀天下、铁肩道义的德性情怀。岳麓作为一种学术理想所蕴含的正是传道济民的育才教风、开阔恢弘的文化气象、精邃创新的思想诉求、深远道义的天下情怀。

巍巍麓山，浩浩湘江；蒸湘文教，渊薮久远，堂堂学府，源远流长。且不说舜开德教之始，炎教稼穡之先，彭头山启稻种之源，城头山发城镇之光；论文教之始，就有曾为“周师”、比孔子早约500年、堪称中华第一师的鬻熊，几与孔子同时、曾为楚太子傅教人崇善的申叔时，以及首倡“圣化之术”、董仲舒仰慕之西汉长沙王太傅贾谊。唐末宋初岳麓、石鼓、城南诸书院的创建，潇湘再现洙泗之风。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倭寇

侵扰中华，国难当头，国师初创于蓝田，虽国运多舛，仍大师云集，弦歌不绝。廖世承、孟宪承、高觉敷、刘佛年、陈东原，一代名家汇聚于此，共襄教育学术之繁荣。1949年迁长沙，假岳麓，伴湘江，莘莘学人郁郁成长。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看今朝。时光进入20世纪末，适逢改革开放之盛世，新一代教育学人远追蓝田之薪火，近染岳麓之魂灵，遥望星火追慕先贤，坦然面对教育发展现实，积极融入教育改革实践，深入探究教育理论精髓，咬定青山不放松，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无悔。

学术昌明贵在薪火相传。古人云：德为立人之本，学为立身之本，行为立家之本，事为立功之本。魏文帝曹丕曾说：“文章乃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遂借国家级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教育学”建设之契机，我们集岳麓教育学人近年研究之所得汇编成卷，刊印于世。丛书名为“岳麓”，并非仅取地域之意，乃在赓续历来的教育学术之精神，秉持仁爱精勤的大学理想。学者以“岳麓”命名，与其说是言述一种学术派别，毋宁说是传达一种学术理想：

一群仰观麓山苍翠、俯瞰湘水流长、活跃教育学界、肩负兴学育才的教育学人，怎样把思想根植于岳麓血脉之中，汲岳麓文脉滋养内心的精神底气；同时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周遭鲜活的教育世界，拓展教育研究的现实情怀与实践意识，探索本土化教育学的深沉内涵与特殊品质。

本土化教育学，意味着教育理论的生命源于本土文化，深深扎根于本土教育实践，积极回应本土教育实践，并且回归于本土教育实践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教育学与本土文化资源、精神气象、教育生活有着内在的承接性和适切性，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话自说，孤芳自赏，与我们脚下的土地毫无关系，从而让我们的思想与言说缺少血色温情而难免苍白乏力。

当然，本土化教育学绝不仅仅归属本土，而恰恰应该是在立足本土的过程中去追求普遍性的教育真谛。本土仅仅指涉言说的对象，而非言说的方式本身，任何学术都是对知识与真理的寻求。学者身份有地域之别，学术思想本身无界。超越现实周遭种种局限，追求精神的无限和价值的普遍，才是学者生命之真义所在。身虽不从，心向往之。

是为序。

张传燧 刘铁芳

2011年10月

目 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高等教育重建政策	(020)
一、重建的背景	(021)
二、《珀西报告》	(029)
三、《巴洛报告》	(034)
四、《技术教育》白皮书	(037)
第二章 高等教育扩展政策（上）	(045)
一、扩展的背景	(045)
二、《罗宾斯报告》	(051)
三、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	(057)
四、《教育：一个扩展的框架》白皮书	(062)
第三章 高等教育扩展政策（下）	(066)
一、新大学的兴起	(066)
二、多科技学院崛起	(076)
三、师范教育扩展	(082)
四、开放大学问世	(096)
五、白金汉大学的创建	(104)
第四章 高等教育调整政策（上）	(106)
一、调整的背景	(106)
二、双重制形成	(110)
三、双重制评价	(115)
四、双重制终结	(119)
第五章 高等教育调整政策（下）	(125)
一、调整的背景	(125)
二、《雷弗休姆报告》	(136)

三、《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绿皮书	(143)
四、《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	(149)
五、《1988 年教育改革法》	(154)
第六章 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上）	(161)
一、改革的背景	(161)
二、《高等教育的框架》白皮书	(167)
三、《1992 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	(172)
四、《迪尔英报告》	(176)
第七章 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下）	(185)
一、改革的背景	(185)
二、《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	(195)
三、《2004 年高等教育法》	(202)
四、布朗执政时期的教育政策	(209)
五、卡梅伦政府的教育新政	(222)
第八章 高等教育政策趋势	(230)
一、市场化	(230)
二、大众化	(249)
三、国际化	(273)
四、终身化	(289)
五、多样化	(298)
结语	(305)
一、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	(308)
二、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因素	(312)
三、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点	(319)
参考文献	(323)
附录一 首相索引	(341)
附录二 机构索引	(342)
附录三 表格索引	(348)
附录四 人名索引	(350)
后记	(357)

导 言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1168年和1209年分别创办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意大利波隆那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并称为“欧洲大学之母”,致力于为上层社会培养人才,并形成了精英教育的传统。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英国大学经过从12世纪到20世纪的长时期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奠定了一个小规模组织的遗传印记,这个印记在20世纪继续意味着在一个小的全国系统中的小大学。”^①这种精英型高等教育系统的优点是规模小、质量高、严格挑选以及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

尽管英国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它却是年轻的,直到“二战”后才开始形成和明确。正如皮特·斯科特(Peter Scott)指出:“……高等教育制度和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前后一致的范畴(无论是管理或学术),在1945年以前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到了19世纪末国家介入高等教育发展也相当有限,大学和学院基本上是私立机构。”^②“的确,除‘牛桥’(Oxbridge,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和苏格兰大学外,其他英国大学都是在19世纪以后创建的,英国现在的大学中有一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了大学地位。结果英国大学中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结合:一方面英国大学极力忠于传统,另一方面它们则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③

由于中世纪欧洲处于罗马教皇的控制之下,当时大学也是为宗教服

① [美] 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96页。

② Peter Scott, *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1995, P. 14.

③ [加] 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张维平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务。教皇期望大学不仅为教会培养合格的神学家和法学家，还要求它们作为一种教会的机构在基督教生活中发挥作用。“早先，学院和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① 1534 年英国国王与罗马教廷决裂并在英国建立国教会，使宗教与国家合二为一。这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基本上受国教会控制，英国国王宣称自己及国教会对于这两所大学拥有绝对的权力，两所大学的教员也是国教会的忠诚追随者，他们被要求进行效忠宣誓。1661—1665 年英国议会对宗教问题作出决策，制定了一系列排斥性法律。如 1662 年《宗教一致法》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包括教士和学校教师）都要购买国教会祈祷书，由此清洗国教内部的反对派；1664 年《宗教集会法》规定，凡是不在国教会教堂做礼拜者要受到严厉惩罚。以上法律使得非国教徒的宗教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国教会外的宗教宽容几乎不复存在。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许多不信奉国教的教师和学生被视为异教徒赶出大学，同时大学也拒绝非国教学生入学。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新生如果不宣誓信守“英格兰国教会信仰三十九条”就不能入学，即使入学了也不能取得学位。

宗教对立迫使大批教师离开学校，大学入学率普遍下降，十七八世纪英国大学整体发展进入了所谓的“冰河期”。到 17 世纪 80 年代，由于国教派继续排挤清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招生人数开始减少，在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最低点。到 1685 年牛津大学因“缺少学生而濒于死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据统计，1680—1689 年，每年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数分别是 321 人和 294 人；1690—1699 年人数进一步下降为 303 人和 238 人；到 1750—1759 年，每年只有 182 名学生进入牛津大学，18 世纪 30 年代后剑桥大学每年的入学人数都低于 200 人。^② 同时学生成分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层出身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富家子弟以上大学为时髦。“穷人子弟几乎从大学完全消失，因为由于富绅和牧师子弟的竞争，他们被排除了获取奖学金和在教会任职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学院寄宿费用的上涨——从 17 世纪的三四十英镑上升到

① [美] 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8 页。

② [瑞士] 瓦尔特·吕埃格主编，贺国庆、王保星等译：《欧洲大学史：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 2 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8 页。

18 世纪中期的一百英镑和 19 世纪的 200 英镑——他们更是被排斥在大学门外。”^①

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水平也令人怀疑，它主要是非职业性的，几乎完全与英国科技和艺术界分道扬镳。“由于大学为其毕业生提供的职业机会相当有限，大学已退化成为一种‘教士学院’。18 世纪，虽然大学仍然继续发挥重要的教育功能，但它们实际上已经与英国当时杰出人物的智力生活隔绝开来了。”^② 伯顿·克拉克写道：“经过一个时期的持续衰退，学校在风气和实践上严重下滑，两校的学术人员和学院学监有迟钝、放荡和造反等坏名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好长一段时间。在 19 世纪初，当洪堡正在按新的原则组建柏林大学，拿破仑正在法国铸造单一的国立大学的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两所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还在沉睡之中。”^③ 当英格兰古典大学因宗教歧视与甄别而陷入低谷和僵局时，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开办的私立学园在英国悄然兴起。私立学园为那些被排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非国教徒子弟提供高等教育场所，主要教授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课程设置贴近现实生活，收费低廉，使用英语教学，既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也不失为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新探索。从 1660—1780 年英国大约开办了 50 所学园。私立学园的兴起既是大学衰败的象征，又是对社会变革的积极反应，它与古典大学的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宗教性、贵族性相反，苏格兰的大学更具世俗化和平民化。由于圣安德鲁斯大学（创建于 1411 年）、格拉斯哥大学（创建于 1451 年）、阿伯丁大学（创建于 1495 年）和爱丁堡大学（创建于 1582 年）四所古典大学推行改革，如设立自然科学和实用课程，校长不再要求宣誓，招收非国教徒子弟入学，降低学费等，吸引了大批来自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学生。“在 18 世纪，爱丁堡大学取代了莱顿大学，成为一个进步的、开明的学习场所，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前来就学。格拉斯哥大学

① [美] 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 页。

② [瑞士] 瓦尔特·吕埃格主编，贺国庆、王保星等译：《欧洲大学史：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 2 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 页。

③ [美] 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版，第 64 页。

也同样享有很高的声望。与‘牛桥’那种狭隘的、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性的教育机构相反，苏格兰的大学在学院围墙之外提供许多吸引人的机会。苏格兰的大学成为交流经验和知识的商业和制造业的国际中心，这一点更加深了它们与英格兰大学的对立。”^① 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认为，苏格兰的大学在18世纪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开近代大学之先河，在开设学科方面也走在前头，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地。英国学者梅尔茨（Merz）指出：“同英格兰大学不同，苏格兰大学不是培育排外精神，不是仅仅鼓励不同中心的师生间的狭隘交流，而是生活在教授和思想的不断交流之中——一如德国大学和其他大陆大学的一贯习惯，但在它们那里规模更大。尽管这对于备受许多英格兰同道称颂的大学或学院的个性来说是破坏性的，但无疑更其增进学术和研究的进步。……英格兰之伟大在于一个个人物，而苏格兰无疑均衡地更多致力于传播现代科学知识。”^② 总之“苏格兰大学”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英格兰大学”的亚系统，它与理智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并在英国高等教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英国虽然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但与德国和美国相比，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势力十分强大。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尽管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讲座，但直至19世纪中期它们始终未能突破古典教育价值观的束缚，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遥相呼应，从而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研究、造就符合工业社会要求人才的中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顽固地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其原因在于：“这种教育，作为一种至高的智力训练，作为目的本身，作为培养真正的绅士的手段，作为所有体面职业的最好的基础训练，被证明是正确的。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和某些没有获得学位的人，在国内和帝国行政机构中继续垄断着政治、教会、司法、大学、公立学校和行政管理中的最高职务。”^③ 然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巨大进步

① [瑞士] 瓦尔特·吕埃格主编，贺国庆、王保星等译：《欧洲大学史：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2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② [英] 梅尔茨著，周昌忠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8～229页。

③ [英] 奥尔德里奇著，诸惠芳等译：《简明英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强调科学知识和重视科学教育已成为时代的精神。当时以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纽曼（Newman）等人为一派，以斯宾塞（Spencer）和赫胥黎（Huxley）等人为另一派的英国高等教育界，就是否实施科学教育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焦点涉及科学知识 with 古典文化知识的价值和重要性。在这场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的论战中，斯宾塞和赫胥黎所倡导的科学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对 19 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英格兰，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史主要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发展史。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一部大学集中的历史，因为仅仅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就垄断了英格兰的高等教育达 6 个世纪：从 12 世纪和 13 世纪早期直到 19 世纪中叶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的创办。”^① 1828 年创办的伦敦大学是一所崭新的大学，它摆脱了宗教束缚，为中产阶级子弟提供人文和科学教育，针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实用性人才，课程设置注重专业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它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所纯世俗的高等教育机构，非国教徒甚至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受宗教限制而被接受，学校课程设置强调科学、历史和其他纯世俗学科。”^② 伦敦大学的出现揭开了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但由于保守主义者和英格兰国教会的阻挠，伦敦大学最初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直到 1836 年才获得政府颁发的皇家特许状（The Royal Charter，英国大学的学位授予权不仅代表学术标准，而且是一种赐予的权利），改称为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并与 1829 年成立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合并为伦敦大学。新成立的伦敦大学凌驾于各学院之上，每个学院保留自己的自主权，财务由各学院独立核算，伦敦大学负责学位考试、学位标准的确立和颁发学位的工作。经过一系列改组伦敦大学后来逐渐成为一所以主持考试和授予学位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到 1900 年发展为一所拥有 56 个学院的联邦型大学实体。“它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虽然它的确也拥有总部办公室和范围广泛的校董会（Court）和理事会（Senate），但它只是由大量的

① [美] 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64 页。

② Willis Rudy, *The University of Europe, 1100—1914*, Association University Presses, London and Toronto, 1984, P. 115.

质量与目的很不相同的机构组成的混合体。”^① 伦敦大学创办不久，1833年在英格兰北部又诞生了一所新大学——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该大学的办学模式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同，注重神学和古典学科，但课程门类比较广博，尤其重视工程教育以适应当地社会需要。1837年达勒姆大学获得授予学位权力的皇家特许状。但由于它消极无为地模仿古典大学，以培养牧师和圣公会教徒为主，到19世纪中期逐渐衰退几乎消亡。至19世纪末英国已有9所大学，其中英格兰4所（牛津、剑桥、伦敦和达勒姆）、苏格兰4所（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和爱丁堡）、威尔士1所（威尔士大学，创建于1893年）。

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的诞生，改变了英格兰地区大学教育的单一结构和功能，为城市学院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自19世纪50年代起，城市学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1851）、埃克塞特大学学院（1865）、利兹约克郡学院（1874）、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1876）、伯明翰梅森学院（1880）、利物浦大学学院（1881）、诺丁汉大学学院（1881）、雷丁大学学院（1892）、谢菲尔德大学学院（1897）等。这些学院不是由英国政府创办，而是从本土涌现出来的，通过满足地方需要获得富商投资或公众捐办。它们大多以当地的重要工业支柱产业为依托，并致力于为后者服务，重视工业与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为所在城市的工业研究中心。体现地方特色的技术开发活动一般都是城市学院的强项。城市学院最初没有学位授予权，它必须获得皇家特许状，因此学生只能攻读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学生在城市学院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和教育后，只能获得毕业文凭或某一行业的资格及能力证书，而这些文凭和证书在当时往往不被传统大学认可。为了取得学位授予权并成为完全大学，城市学院不断加强人文教育和科学研究，提高社会声望和学术水平，至20世纪初这些学院大多得到了英国社会的广泛认可，逐渐升格为有学位授予权的“城市大学”（Civic University），如伯明翰大学（1900）、曼彻斯特大学（1903）、利物浦大学（1903）、利兹大学（1904）、谢菲尔德大学（1905）、布里斯托尔大学（1909）、雷丁大学（1926），但其学术

^①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非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地位和声望仍然不及古典大学。

城市学院的建立是英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英国大学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不只是为教会和统治者服务，也不再为少数富有阶级所垄断，而是面向广大民众提供职业教育，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人才。它的兴起为英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多样化和多层次；同时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古典教育构成压力，最终迫使科技教育堂而皇之进入大学讲坛。到19世纪后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逐步开设了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课程，如造船、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另在德国研究型大学影响下，它们也开始从事物理学、生物学、细胞学、免疫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新学科发展还导致了实验室的创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在1868年、1871年建立了著名的克莱伦顿（Clarendon）实验室和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这两个实验室的建立标志着传统大学进入了新纪元。

19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尚未从十七八世纪的衰退中完全摆脱出来，保守主义色彩仍很明显。“对非英国圣公会教徒进行限制；某些导师的智力质量值得怀疑；要求既过独身生活，又要任牧师职；学院继续控制着大学；忽视实用科学和职业教育；排斥除社会名流、牧师、军人、绅士和贵族子弟之外的所有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①当时的报刊和杂志对古典大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创刊于1802年，以激进、自由见称）批评古典大学坚持为国教会服务，窒息了学生的首创精神。它们有宽敞舒适的住所和充裕的收入，具有钻研学问的有利条件，但它们不仅没有传播知识反而抵制改革，鄙视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甚至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化学教学有损尊严。批评者把大学落后归因于英国牧师，因为教育权掌握在牧师手中，他们害怕青年学习自然科学后对宗教产生怀疑。“这份期刊在政治、文学和科学中开创一种新的批判，引导猛烈抨击一切阻碍思想自由发展和科学与实际兴趣之进步的形形色色传统政府、情趣和学术。这评论尽管并

^① [英] 奥尔德里奇著，诸惠芳等译：《简明英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非总是得到明智的应用,但其肯定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唤起古老的英国大学摆脱停滞状态,尤其激励年轻志士仁人促进延搁已久的教学改革。”^①对古典大学的批评同样来自《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创刊于1823年)和《教育季刊》(Education Quarterly 创刊于1831年),前者要求由世俗人士控制大学,以便大学摆脱国教会的束缚;后者呼吁对大学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革,将自然科学和数学作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由于舆论的积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古典大学的弊端,要求政府干预大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干预。1850年政府首次成立了由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为主席的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负责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育状况进行全面调查,1852年发表了《皇家委员会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报告指出,大学校园风气日趋衰败,在师生中普遍存在赌博和色情等诸多问题,既败坏学术风气也影响教学质量。报告建议如下:取消宗教限制,招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士;在课程方面,除了要求学生继续学习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传统学科外,允许他们选择法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新兴学科;对贫困学生申请奖学金的限制予以放宽等。在皇家委员会报告的直接影响下,英国议会分别于1854年、1856年颁布了《牛津大学法》和《剑桥大学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除原来制订的学则,加强大学评议会(相当于学术委员会,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的权限,对非国教徒部分开放等。尽管立法的内容还比较保守,但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开启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及后来两项法案的颁布对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首次制定了议会干预大学的原则。187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大学考试法案》,宣布废除申请学位的宗教审查(神学除外),大学教职员不受宗教信仰约束,可以结婚和参与学院管理等。英国议会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取消两所大学自中世纪以来享受的种种特权及某些宗教限制,至19世纪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各种限制和故步自封局面被打破,开始面向世俗阶层招生和培养人才。如

^① [英] 梅尔茨著,周昌忠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7页。

1891年剑桥大学来自地主和牧师家庭的学生比例下降为40%，1910年进一步降至23%。大学不仅培养医生、工程师和公司经理，而且还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培养了大学毕业的女教师。据统计，1906—1914年牛津大学毕业生进入工商界的比例约占7%~14%。到1914年英国大学无论在公众服务还是私人利益方面都具有多重教育功能。

19世纪后半期女子获得了上大学的权利，这是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新鲜事情。1848年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莫里斯（Maurice）在伦敦创办了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为女性开设一些讲座课程。1849年伦敦又建立了一所女子学院——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后于1869年成为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1869年和1871年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克拉夫（Clough）在剑桥大学分别建立了专门的女子学院——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1871年牛津大学成立“女子教育协会”，并先后创办了4所女子学院，即玛格丽特学院（1878）、萨默维尔学院（1879）、圣休斯学院（1886）和圣希尔达学院（1893）。另外，城市学院从创办起就接纳女生，1878年伦敦大学允许为女生颁发学位。1892年4所古老的苏格兰大学开始向女生颁发学位，1893年威尔士大学也向女生颁发学位。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最早接受女生入学，却是最后给予她们学位的学校。剑桥大学直到1921年才授予女生名义上的学位，1947年她们才获得完整的大学学员身份。牛津大学的女生也是到1920年才开始获得学位。尽管最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仅限于社会中上层家庭，但它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开辟了道路。

19世纪后半期，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是大学推广运动（The 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该运动旨在满足广大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发起人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1867年斯图亚特受英格兰北部妇女高等教育促进会的邀请，在利兹、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地为工人和妇女举办各种讲座，学员的学习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设想创办一种“流动大学”（Peripatetic University），即由大学教授在各地巡回讲课，使更多的民众能够受到高等教育。1873年剑桥大学接受斯图亚特的建议正式发起了大学推广运动。1875年剑桥大学成立了常设机构——大学推广部。在其影响下，1876年伦敦大学成立了大学教学推广学会；1878年牛津大学也建立了